

管理能力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行为¹

——兼论出口竞争新优势培育

徐乙尹² 武家辉³ 余赛男⁴

摘 要 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稳外贸除了继续坚持科技自主创新,加快培育以管理能力为基础的企业出口竞争新优势 also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展开的微观调查问卷数据度量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在此基础上采用 Heckman 两阶段回归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能力对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这一结论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管理能力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出口;(3)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融资约束较小、运营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突出。本研究有助于从改善企业自身管理能力的视角为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及进一步培育我国出口竞争优势提供新的思路 and 理论经验借鉴。

关键词 企业管理能力;企业出口;出口竞争新优势

0 引言

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 WTO 以来,我国出口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并在 2009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然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叠加影响使得全球总需求进一步收缩。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世界银行将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1.7%,是近 30 年来的第三低增速,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步入衰退的边缘(World Bank, 2023)。因此,我国所面临的外部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将大大提高。同时,我国经济自身也面临着内

1 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因果效应、机制及对策研究”(批准号:72173100)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课题研究项目的资助。

2 徐乙尹,成都大学商学院副教授,E-mail:xuyiyin2010@126.com。

3 武家辉(通信作者),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wsxwu@126.com。

4 余赛男,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级经济师,E-mail:625926470@qq.com。

生动力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遇阻等新问题。在此背景下,稳外贸成为我国稳增长稳就业、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稳定外贸规模不仅有利于稳定和增加国内就业,更重要的是通过促稳提质,逐步确立起我国出口竞争新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稳外贸能够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促进我国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使资源和要素从低效率企业转移至高效率企业,从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稳住外贸基本盘需要聚焦外贸企业,这不仅要求为出口企业提供良好的外贸发展环境,同时也需要企业自身通过深入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以及东盟、“一带一路”等区域市场等途径来稳定出口规模。因此,作为出口的主体,稳外贸的逻辑起点在于确认决定企业出口的因素,通过改善或调节这些因素从而稳定外贸主体,巩固并进一步扩大企业出口。异质企业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具备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出口,即存在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Melitz, 2003),部分国内学者也证实了这一效应在中国仍然成立(钱学锋等, 2011),此后有关生产率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企业出口影响因素的重要文献之一。不可否认的是,此类文献大多是将企业生产率视为企业技术能力,虽然在此基础上部分文献通过分解生产率的内在构成,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生产率的相关影响因素如技术创新等对出口行为的作用(Caldera, 2010),但仍然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分析。除技术能力外,管理能力是企业另一类最为重要的能力(周茂等, 2015),部分文献也开始逐步重视管理能力对企业效率的重要性,如Gort and Lee(2003)利用美国的经验证据说明管理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但是尚未有文献关注到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并展开对应评估。那么,管理能力作为体现企业组织效率的重要特征以及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参与出口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出口强度呢?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是通过何种路径发挥作用以及是否存在对不同类型的异质性影响呢?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这将为企业通过改善自身管理能力扩大出口,并在此基础上为实现我国稳外贸稳增长和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提供重要启示。

事实上,管理作为企业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实施活动,与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共同构成完整的生产过程,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可以促使企业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进而能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雷明和孙曙光, 2010)。从理论上来说,管理作为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Acemoglu et al., 2018),能够调整内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使用,因此也成为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程虹, 2018)。针对管理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相关学者主要进行了两方面论证,一类是利用企业投入衡量管理

效率,如 Gort and Lee(2003)利用美国制造业数据发现管理效率的提高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另一类是从企业管理团队的背景特征角度出发,如 Acemoglu et al. (2018)论证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部分特征因素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率。那么,管理能力是否会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这一渠道促进企业出口呢?这也将是本文研究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的关键所在。

本文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展开的微观调查问卷数据,采用 Heckman 两阶段回归实证检验了管理能力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相较于以往文献更多关注技术及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本文基于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能力这一全新视角对企业出口行为进行研究,是对当前研究企业出口行为文献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丰富了关于企业出口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2)本文从企业生产率、出口模式以及创新水平出发,分别确认了管理能力提升促进企业出口的内在机制。并进一步从企业所处地理区位、企业融资约束、企业规模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后续的结构安排为:第1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第2部分是估计策略、变量与数据;第3部分是经验研究结果;第4部分是机制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1.1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对此将从四个方面梳理相关文献:第一,企业出口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二,量化企业管理能力的研究;第三,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第四,企业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因素影响企业出口的研究。

既有文献从多个方面探讨了企业出口的影响因素。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外部贸易条件变化会影响企业出口。如田巍和余森杰(2013)基于进口中间品的角度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中间品关税以及其他投入成本的大幅下降能够显著扩大企业出口。Crowley et al. (2018)基于2000—2009年中国海关数据,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构造准自然实验,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降低中国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如果不存在由关税造成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国企业进行出口的概率平均每年提高约2%。除了上述不可预期的外部政策冲击外,根据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产业转移扩大与目标国的成本差异,从

而能够为两国的贸易创造有利条件(Kojima, 1978),相关文献也论证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的机会,还能够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蒋冠宏和蒋殿春, 2014)。其次,内部贸易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推动企业出口。针对这一视角,相关文献主要关注了融资约束、金融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变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Feenstra et al., 2014; Coşar and Demir, 2016)。从企业层面来看,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提出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展开研究。如Crespi et al. (2007)利用英国的数据研究发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通过“自我选择效应”进行出口;钱学锋等(2011)等国内学者通过使用中国本土的企业数据进一步说明了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弥补沉没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出口,再次证实了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除了生产率之外,部分学者还考虑了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信息化水平、国际化水平、金融化行为对其出口的影响。如Caldera(2010)等研究说明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对企业的出口决策产生积极影响。Yadav(2014)研究论证了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进入国际市场的固定信息成本,对提高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郑妍妍等(2015)发现获得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扩大出口。马妍妍和俞毛毛(2021)认为企业短期的金融性投资可以有效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在长期这种金融化行为则会“替代”企业出口,降低出口的“集约边际”。但上述角度也多是將生产率进行解构,仍然属于企业的技术能力范畴。总结来看,既有研究已经从宏微观方面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探究了这些因素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机制和渠道,但尚未有文献关注到企业管理能力这一微观视角。

对于如何定义企业管理能力既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尝试对其量化,但目前尚未达成一致。Andersson and Svensson(1994)使用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数量考察企业的管理能力;Bloom and Van Reenen(2007)开创性地提出能够测度企业管理特征的管理效率调查问卷,利用国际调查数据的18项标准从绩效、考核、管理实践等方面考察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并将企业管理能力划分为1到5个等级,等级越高则表示管理能力越强。相比之下,更多研究则使用管理投入、管理费用等指标表征企业的管理成本,并认为管理成本越高意味着企业对组织管理的投入越多,则管理能力就越高(Eisfeldt and Papanikolaou, 2013; 周茂等, 2015; Giorelli, 2019)。除了企业自身投入外,由于人口自身背景因素会对其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企业管理者的不同背景特征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管理行为,从而影响其管理能力,如具有国外工作经验的管理者更加具备全球化思维,能够推动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整合全球资源,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的效率,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有积极作用(Giannetti et al., 2015)。相关文献也探讨了如管理者

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政治背景等特征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李焰等,2011)。回顾既有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当前的衡量方法可以反映企业组织管理的部分特征,但尚未实现对管理能力的充分展现,因此这也为本文重新量化企业管理能力提供了可能。

管理能力及其特征因素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部分学者通过直接构造表征企业管理能力的指标,考察其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Gort and Lee(2003)将企业的管理能力来源定义为三个方面,并考察了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二者具有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周茂等(2015)使用中国工业企业的管理费用投入对管理能力进行量化,认为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管理能力越高则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程虹(2018)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构造了管理效率指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越高,越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Giorcelli(2019)通过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因果识别,认为开展管理培训可以优化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能力,从而能够改善营业收入、全要素生产率等企业绩效。Qiu and Yu(2020)构造了表示管理效率的指标,发现管理效率越高的企业,其出口产品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学者通过考察表示企业管理能力的特征因素,间接讨论了管理能力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相关文献认为企业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如学历、年龄、政治背景、海外背景、工作经历等对企业的技术研发、运营绩效、社会责任水平等方面的影响较为显著(刘运国和刘雯,2007; Saidu,2019; 张琦等,2019)。可见,关于企业管理能力与其微观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既有研究已经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但鲜有研究涉及管理能力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行为这一重要视角,因此本文的研究将对现有文献作出有益补充。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文献还来自于企业管理者背景特征与出口行为关系的研究。由于人口自身背景因素会对其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企业管理者的不同背景特征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管理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其管理能力,因而这些特征因素也可能对出口产生一定的影响效应。特别是与企业出口等国际化行为高度关联的背景特征因素,会对企业出口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具有丰富出口工作经验的高管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十分明显。Masso et al.(2015)研究发现管理者的出口经验越丰富,对企业出口倾向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这种影响具有地区专属性,且当出口目的地越近时,作用效果越明显。其次,对于具有海外学习或者留学背景的企业高管而言,他们不仅更加了解留学国家的市场信息,并且一般而言具备更高的技术素质和专业素养,因此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等渠道促进企业出口并提高出口规模(许家云和孙文娜,2017)。最后,

Herrera-Echeverri et al. (2016)、綦建红和杨文慧(2020)等发现企业内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的高管比例越高,对于企业出口强度的积极作用也就更加明显,并且这一比例积累到一定规模后会进一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这是由于这类企业高管会更加重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加之他们对目标国市场更加了解,因此依靠其自身的多元化知识、专业素质和国际化经验能够降低企业出口的不确定性,对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具有积极影响。同时,具有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的高管能够为企业带来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并且这些高管在以往的工作履历中已经与多数国际供应商、经销商等建立起一定的合作关系,因此能够缓解企业出口的竞争压力,从而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与绩效(Oxelheim et al., 2013)。综上所述,虽然企业管理者的部分背景特征会对其管理能力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能够全面表征管理能力这一特征,因此,本文的研究工作将从新的视角对管理能力这一变量进行界定,直接考察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决策以及出口强度的影响效应。

本研究能够对既有相关研究作出一定有益的补充,体现在:首先,从管理能力这一表示企业生产组织水平的视角出发,探究其对企业出口决策以及出口强度的影响,是对当前主要从生产率等技术能力视角出发研究企业出口行为文献的补充和完善,丰富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研究,在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利用企业高管的工作经验表征管理能力,是对衡量企业管理能力的有益探索,对于企业如何优化自身管理水平以更好应对出口不确定性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最后,阐述了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行为以及出口强度的机制渠道,证实了管理能力是通过提高企业效率和创新水平这一重要途径促进企业出口,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重要意义。

1.2 理论假说

管理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投入环节,是企业生产力的重要表现之一(雷明和孙曙光,2010),也是除了生产率以外企业异质性的重要体现(Qiu and Yu, 2020),能够对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做出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运营绩效。如Bloom et al. (2010)认为管理效率的高低会影响企业雇佣高技能劳动力、使用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决策,并且对产品生产的监督、审核等活动产生影响,最终将对企业产品的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周茂等(2015)研究发现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管理能力越高则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针对企业的出口行为,许家云和孙文娜(2017)、綦建红和杨文慧(2020)等认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企业高管会

更加重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并且由于他们对目标国市场更加了解,因此依靠其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国际化经验能够推动企业进行出口。Masso et al. (2015)认为企业管理者的出口经验是企业出口决策的关键驱动力,这也意味着如果管理者具有较强的出口经验,那么企业就更加倾向于出口。同时,具有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的高管能够为企业带来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并且上述高管在以往的工作履历中已经与国际供应商、经销商等建立起一定的合作关系,因此能够缓解企业出口的竞争压力,从而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与绩效(Oxelheim et al., 2013)。除了能够影响企业管理能力的个人背景特征因素外,管理水平已经成为企业参与海外市场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其产品竞争力往往较差,不仅会影响其能否进入国外市场,还会进一步决定其贸易利得。Qiu and Yu (2020)构造了表示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指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越高的企业,进一步扩大其出口产品范围的可能性就越大。张体俊等(2022)利用表示企业组织资本存量的累积销售、一般和行政费用投入表征企业管理水平,认为投入费用越高则企业的管理能力越强,对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和出口质量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管理能力较高的企业通常具备高素质的劳动力,能够在生产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通过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能够进一步降低使用时的摩擦成本从而发挥出更大的出口促进效应(孙浦阳等,2018)。胡昭玲等(2020)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具备更高管理能力的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本优势,利用全球分工渠道积极协调上下游生产联系,从而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交易成本,并且促使企业从出口中学习,不仅有助于扩大企业出口,还能够突破技术升级瓶颈提升出口竞争力。可见,无论是代表管理能力的高管特征因素还是其他关于管理能力的量化分析,都说明了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1: 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

具体而言,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行为是通过何种渠道实现的呢?首先,从企业效率与成本角度看,企业生产率与出口之间的“自选择”关系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克服出口成本从而有利于其进入出口市场(钱学锋等,2011)。出口企业需要降低进入海外市场的信息搜寻成本和沉没成本以推动企业持续出口,同时还能够以此降低企业退出的风险并进一步提高出口强度(段文奇和刘晨阳,2020)。因此,如果企业具有更高的管理能力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那么就能进一步推动企业出口,而管理能力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关系已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论证。如Bloom et al. (2013)运用随机实验研究发现管理能力提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李唐等(2018)发现管理能力越高

的企业,能够通过提升产品质量竞争力和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李唐等(2020)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能力提升还能够从增强风险预测能力、改善人力资本、提高创新能力等方面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 Lohrke et al. (2003)探究了高管背景的影响作用,认为出口企业的高管团队多样化程度越高,在面临出口不确定性因素中越容易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也就越明显。与此同时,出口企业面临着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两种出口模式选择,虽然通过贸易中间商进行间接出口可以降低企业成本,但由此造成的产品价格提高不利于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长期发展。而直接出口则需要面对运输过程的“冰山”成本和目标国市场建立营销渠道等可变成本,因此,如果企业通过提高管理能力有利于其扩大直接出口的比例,说明管理能力提升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出口的生产率和成本条件,也意味着企业进一步提高企业出口强度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通过这一途径将进一步证实管理能力对企业扩大出口的影响作用。其次,创新对企业出口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较好地整合内部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继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压缩产品价格,提高产品整体竞争力,从而使得企业有更强的意愿进入出口市场(Caldera, 2010),进而可能会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进一步影响。因此,如果企业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有效提升创新能力,那么可能会对该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可能通过人力资本升级从而提高整体的劳动力素质和创新能力,促进资源更加优化配置,并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邓悦和蒋琬仪(2022)充分论证了这一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劳动力素质,形成企业内部年轻化的人力资本,并借此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程虹等(2018)也认为管理效率可以充分体现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其对企业的研发创新的引导作用十分显著。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 2: 管理能力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出口。

2 估计策略、变量与数据

2.1 估计策略

为了研究管理能力提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一种较为直观的方法是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直接回归分析,但这种做法至少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管理能力不是完全外生的。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一部分,不同企业的管理能力差异并非完全随机分配的,可能与企业规模、要素禀赋等企业特征高度相关(程虹, 2018),因此直接使用 OLS 考察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会降低

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其次,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有较多企业的出口占比值为零,即不存在出口行为。如果直接将这些样本剔除,则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差。这是由于企业是否出口可能并不是完全随机的,假如只考虑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就极有可能出现样本选择偏差的内生性问题,这种非随机的样本选择也会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

为了最大限度解决上述问题,从而使评估更加科学合理,本文将利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Heckman, 1979)进行估计。Heckman 两阶段模型通过加入修正样本选择偏差的估计值,能够较好地解决出口行为中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具体而言,在第一阶段本文针对企业是否出口,利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第二阶段在企业是否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两个阶段的回归方程具体如下:

$$\text{Probit}\{\text{choice}_{icj} = 1\} = \alpha_1 + \alpha_2 \text{lmanage}_{icj} + \alpha_3 \text{quality}_{icj} + \delta X_{icj} + \theta_i + \theta_c + \varepsilon_{icj} \quad (1)$$

$$\text{Intensity}_{icj} = \beta_1 + \beta_2 \text{lmanage}_{icj} + \sigma X_{icj} + \gamma M_{icj} + \theta_i + \theta_c + \varepsilon_{icj} \quad (2)$$

其中,脚标 i, c, j 分别表示行业、城市、企业,被解释变量 choice 代表制造业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 Intensity 表示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 lmanage 代表企业的管理能力; quality 为企业是否获得产品质量认证的虚拟变量^①,作为阶段一区别于阶段二的识别变量; θ_i 是企业所在行业的固定效应,控制行业内所有企业面临的共同行业特征影响, θ_c 为企业所在城市的固定效应,控制城市内所有企业面临的共同城市特征影响; M_{icj} 为逆米尔斯系数; ε_{icj} 为随机误差项。最后,除了管理能力外还存在其他企业层面的特征可能会对评估产生影响,对此本文参考李兵和李柔(2017)等的做法控制了如下变量(X_{icj}):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

2.2 变量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包含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两个核心被解释变量。出口倾向是用于判断企业当年是否进行出口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出口则赋值为 1,未出口则赋值为 0。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用企业国内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值来判断企业是否出口,具体而言,如果该比值为 1,意味着企业的所有产品均销往国内,即企业不存在出口行为($\text{choice}=0$);反之,如果该比值小于 1,意味着该企业的部分产品出口至国外市场,则企业进行了出口($\text{choice}=1$)。出口强度(Intensity)利

^① 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进行估计时,需要在阶段一的选择方程中加入额外的控制变量进行识别,该变量应与企业是否出口的决策相关同时又不影响企业的出口规模。

用调查数据中直接出口销售额和间接出口销售额的总和占企业当年销售总额的比重来表示,表征企业的出口规模大小。

2.2.2 解释变量

企业管理能力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如何定义企业管理能力既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尝试对其量化。Bloom and Van Reenen(2007)开创性地提出能够测度企业管理特征的管理效率调查问卷,利用国际调查数据的 18 项标准从绩效、考核、管理实践等方面考察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并将企业管理能力划分为 1 到 5 个等级,等级越高则表示管理能力越强。相比之下,更多的研究则使用管理投入、管理费用等指标表征企业的管理成本,并认为管理成本越高意味着企业对组织管理的投入越多,则管理能力就越高(周茂等,2015;Giorcelli, 2019)。除管理成本外,部分研究还利用主营业务收入与资产总额的比值以及表示企业组织资本存量的累积销售、一般和行政费用来衡量企业的管理水平(Eisfeldt and Papanikolaou, 2013)。可见对于企业管理能力的准确度量具有较大的难度,既有文献目前也尚未形成一致,上述度量方法还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基于量表的问卷调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仅仅适用于部分被调查企业,并不适用于本文的企业样本;二是,从管理成本的视角只能一定程度间接表征管理能力,缺乏对管理能力总体特征的直接考量。对此,受制于可得的企业样本信息数据,尽量更为客观直接地表征管理能力的总体特征,本文研究较为创新地使用企业高管在本行业的工作经验来衡量管理能力。通常来说工作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能够最大程度提高企业的组织管理效率,并对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地,本文使用调查数据中 b7——“高管在本行业的工作年限”并取对数来表示企业的管理能力。后文还将进一步采用“是否引入新管理流程”替换度量企业管理能力进行稳健性检验。

2.2.3 控制变量

产品质量认证。使用“企业是否获得国际组织质量认证,例如 ISO9000、ISO14000、HACCP 等”表示,如果获得认证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选择产品质量认证作为区别两个阶段的控制变量是因为,通过国际质量认证有利于提高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帮助企业开拓出口市场(郑妍妍等,2015),而进入出口市场后,这种认证对出口强度的大小将不会产生进一步影响。

企业年龄。企业年龄一般是指企业的存续时间,即在行业中经营的年限。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其市场经验将不断提高、环境适应能力将不断增强、资源配置和风险防控的能力会更加完善,并且也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Jensen et al., 2001),从而可能对其出口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企业存续时间的增加,其面对市场的灵活性也有可能固化,进而可能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

生不利影响。基于这种情况,本文需要对这一特征进行控制,具体而言,本文使用 2011^① 减去“企业正式注册的年份”得到企业截至 2011 年的经营年限,然后再取对数得到“企业年龄”变量。

企业规模。除了生产率之外,相关研究发现较之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更有能力进入出口市场且出口强度更高。Lancheros and Demirel(2012)认为企业规模已经逐渐成为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认为,具备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进入出口市场的原因在于生产率能够弥补巨额的沉没成本。从成本角度来看,规模较大的企业比小规模企业更有实力应对出口成本。因此,本文使用调查问卷中问题 L1——“2011 年企业拥有全职员工数量”并取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

资本密集度。作为体现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资本密集度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Lu(2010)发现在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中,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更加倾向于国内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会选择出口国外市场,表现出与“自选择效应”相反的结果。因此,本文使用企业的总固定资产(机械、交通运输工具、设备加土地和建筑的总和)除以公司的员工数,再取对数得到资本劳动比用以衡量资本密集度。

逆米尔斯系数。根据 Heckman(1976)对样本自选择问题的纠正方法,在第一阶段预测每个企业进行出口的概率,然后将所有企业出口的概率合成一个新的变量,即逆米尔斯系数。这个新变量将作为第二阶段的控制变量,所得到的估计系数是否显著可以用来说明是否存在样本自选择偏差以及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法的必要性。

2.3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是 2012 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展开的微观调查问卷数据。该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这种方法较之简单随机抽样更适用于针对异质性企业的研究,并且更容易控制调查成本,调查问卷所呈现的数据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企业特征。该问卷一共包含了十四个部分,分别是企业的调查准备、基本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产销情况、竞争程度、生产能力、土地和获得许可情况、技术创新、违法犯罪、金融发展、政商关系、企业员工、营商环境以及运营绩效,数据涵盖内容较为全面,可以从中获得企业不同层面的具体指标,方便本文选取所需内容展开研究。从调查范围来看,该问卷涉及来自制造业、服务业和零售业共计 2700 家私营企业、148 家国有企业以及 86 家外资企业,调查样本均匀分布在东中西部的 25 个城市。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数据样本中的制造业

^① 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实际是在 2011 年进行的。

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1727 家企业。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出口	1207	0.3281	0.4697	0	1
	出口强度	1207	0.1439	0.2715	0	1
解释变量	管理能力	1207	2.7535	0.4614	0.6931	3.8501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1207	2.3302	0.5759	0	4.8203
	企业规模	1207	4.3692	1.1314	1.6094	6.1092
	资本密集度	1207	14.6920	16.0621	0.4	57.6923
	质量认证	1207	0.7084	0.4547	0	1

3 经验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与 Heckman 选择模型进行对比并证明选择该模型的必要性,本文分别考察了不考虑样本选择偏误的 Probit+OLS 回归以及 Heckman 两阶段回归,表 2 汇报了两类回归的具体结果。如表 2 第(1)~(4)列所示,在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其他特征因素以及行业和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后,可以发现无论是 Probit+OLS 还是 Heckman 两阶段回归模型,核心解释变量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对出口倾向的估计系数为 0.3578 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对出口强度的估计系数值分别在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高管管理能力越强企业越倾向于出口,且对于已出口企业而言,管理能力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从控制变量上来看,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规模因素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出口以及进一步提高出口强度。值得注意的是,如表 2 第(4)列所示,逆米尔斯系数(Mills)的估计系数值显著为正,表明在本文的研究中出口企业的样本选择偏差确实是存在的,也再次证明了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法的必要性,因此,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使用 Heckman 选择模型进行估计。

表 2 管理能力提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行为	Probit+OLS		Heckman 两阶段	
	(1)	(2)	(3)	(4)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管理能力	0.3578 *** (0.1111)	0.0430 ** (0.0180)	0.3578 *** (0.1111)	0.0943 *** (0.0317)

续表				
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行为	Probit+OLS		Heckman 两阶段	
	(1)	(2)	(3)	(4)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企业年龄	-0.1495 * (0.0788)	-0.0439 *** (0.0151)	-0.1495 * (0.0788)	-0.0651 *** (0.0185)
企业规模	0.3570 *** (0.0453)	0.0425 *** (0.0066)	0.3570 *** (0.0453)	0.0990 *** (0.0297)
资本密集度	0.0118 *** (0.0030)	0.0007 (0.0004)	0.0118 *** (0.0030)	0.0025 ** (0.0010)
质量认证	0.1671 (0.1143)		0.1671 (0.1143)	
Mills				0.2035 ** (0.0988)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1912		0.1942
观测值	1207	1207	1207	120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3.2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从不同估计方法、替换解释变量、排除外资企业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3.2.1 不同的估计方法

基准回归中,本文在 Heckman 选择模型的第一阶段使用 Probit 方法进行估计。为了排除估计方法选择偏误,本文将在第一阶段分别改用线性概率模型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LPM) 和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表 3 的第 (1)~(2) 列是第一阶段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管理能力提升对企业出口倾向及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 (3)~(4) 列是第一阶段使用 Logit 模型估计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的结论一致,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能力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并且能够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上述结果均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①。

3.2.2 替换解释变量

如何有效衡量管理能力是本文的一个重点,由于企业管理能力的衡量较为

^① 由于 Probit 与 Logit 所使用的分布函数不同,其所估计出的原始系数并没有特定的经济意义,在此我们并没有比较三种估计方法下的选择模型系数。

复杂,使用高管的工作年限作为代理变量只能部分反映其大小,对此我们进一步使用调查问卷中“是否有引进新的管理流程”作为管理能力的替换变量重新进行估计。引入新的管理流程一方面体现了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能够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引入新的管理流程可能会弥补既往管理过程中的不足,使企业的组织管理更加科学合理,并且有效提升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与效率,从而会对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对此,本文构造“是否引入新管理流程”变量。具体而言,如果企业引进新的管理流程则取值等于 1,否则为 0。估计结果如表 3 第(5)~(6)列所示,可以发现,替换后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引进新的管理流程”对是否出口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对出口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符号也为正,说明管理能力的改善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出口选择。上述结果进一步表明了管理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推动企业出口。

表 3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行为	不同的估计方法				替换解释变量		排除外资企业	
	(1) 是否出口 (LPM)	(2) 出口强度	(3) 是否出口 (Logit)	(4) 出口强度	(5) 是否出口	(6) 出口强度	(7) 是否出口	(8) 出口强度
管理能力	0.1040*** (0.0322)	0.1045*** (0.0387)	0.6026*** (0.1942)	0.0890*** (0.0282)			0.4146*** (0.1168)	0.1391*** (0.0437)
是否引入新管理流程					0.2834*** (0.0890)	0.0222 (0.0206)		
企业年龄	-0.0411 (0.0251)	-0.0679*** (0.0201)	-0.2492* (0.1347)	-0.0627*** (0.0175)	-0.0625 (0.0735)	-0.0421*** (0.0147)	-0.1237 (0.0831)	-0.0631*** (0.0197)
企业规模	0.1006*** (0.0122)	0.1074*** (0.0374)	0.6140*** (0.0802)	0.0942*** (0.0254)	0.3630*** (0.0460)	0.1040*** (0.0326)	0.3610*** (0.0467)	0.1190*** (0.0375)
资本密集度	0.0033*** (0.0009)	0.0027** (0.0012)	0.0199*** (0.0052)	0.0023** (0.0009)	0.0120*** (0.0030)	0.0027** (0.0011)	0.0108*** (0.0031)	0.0027** (0.0012)
质量认证	0.0475 (0.0322)		0.2668 (0.2007)		0.1425 (0.1147)		0.1006 (0.1177)	
Mills		1.0733* (0.5864)		0.1050** (0.0468)		0.2143** (0.1085)		0.2919** (0.1262)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2209	0.1935		0.1952		0.1879		0.1963
观测值	1207	1207	1207	1207	1200	1200	1151	1151

3.2.3 排除外资企业样本

按照企业性质划分,我国的部分对外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这部分企业从其母国“落户”至中国,然后再将其产品出口至母国及其他国家。值得关注的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往往是为了服务其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等战略的需要,而不是由生产率的自我选择效应所导致的(周茂等,2015)。事实上,成熟的国外销售渠道使得外资企业的产品销售至目标国市场所面临的出口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并不需要较高的生产率弥补沉没成本。此外,Lu et al. (2010)等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可能存在着“生产率悖论”的问题,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对外资企业出口的特殊性进行考察。对此,本文在制造业企业样本中剔除外资企业的子样本后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的第(7)~(8)列所示,可以看出,排除外资企业样本后,管理能力的估计系数在两个阶段都为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再次证实了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的积极作用。

4 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机制分析

前文的估计结果已经表明管理能力提升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以及出口规模的扩张,那么这种促进效应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的呢?此外,管理能力作为企业内部极为重要的生产发展因素,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出口行为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呢?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本文将在这一部分展开详细分析。

4.1 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出口的机制分析

4.1.1 管理能力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1) 管理能力与企业生产率

雷明和孙曙光(2010)将企业生产率进一步分解至管理能力层面,说明管理能力是企业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企业管理方法的改进,进一步还能推动企业生产要素质量、产品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一系列活动的增强,因此能有效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程虹,2018)。同时,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率差异是其出口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出口需要克服较高的贸易固定成本,具有一定的进入壁垒,因此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有能力弥补这类成本,并选择进入出口市场。所以,本文可以合理推测,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是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一个重要渠道。为了刻画企业生产率,本文借鉴叶蓁(2010)的做法,采用销售收入与员工人数之比的对数值衡量企业生产率。表4第(1)列报告了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与预期一致,说明管理能力越高对企业生产率水平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这能够为提高企业出口倾向以及扩大出口规模创造有利条件。

2) 管理能力与企业直接出口占比

对于企业而言,其产品的销售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销售至本国市场,另一种则是出口销往海外市场,而企业如果进行出口将面临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两种选择。间接出口一般是企业以贸易中间商为中介,间接地将所生产的产品销售至国外市场,这种出口方式能够较好地缓解出口所需的固定成本,降低“自选择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门槛要求,这也意味着企业出口将变得更加容易。而直接出口企业需要支付较高的出口成本,这部分成本不仅包含产品的运输费用,还包括企业在目标国市场相关的销售费用。因此,如果企业能够进行直接出口,说明企业的生产率等条件足以弥补这部分成本,并且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这也将促使企业继续扩大出口规模。本文认为,如果管理能力的提高能够扩大企业直接出口的比重,也就意味着管理能力提高能够给企业创造生产率和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将对企业的出口行为有十分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对此,本文使用调查数据中直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衡量直接出口比,以此来考察企业直接出口的强度。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4 第(2)~(3)列所示,可以看出管理能力越高的企业不仅会主动选择出口,还会提高直接出口的规模。上述结果进一步表明,管理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企业直接出口的比重,在这种出口模式下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出口规模。

4.1.2 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为了进入出口市场以及维持出口规模,必须进行不断地创新,创新水平越高,则企业的出口规模越大(Raymond, 1966)。一般而言,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整合企业内部资源,通过技术升级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压缩产品价格,提高产品整体竞争力,从而使得上述企业有更强的意愿进入出口市场(Caldera, 2010)。对此,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对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行刻画,以研究管理能力提升能否通过创新渠道来扩大企业的出口。如何有效量化企业的创新水平是一个关键点,使用研发(R&D)投入以衡量企业创新是当前较为普遍的一种做法,对此本文做如下处理:首先,利用调查数据中企业自身是否存在 R&D 投入活动(存在赋值为 1,否则为 0)以衡量企业独立创新水平,其次利用外部企业与企业自身是否存在研发投入合作(存在赋值为 1,否则为 0)来衡量企业的合作创新水平,然后使用 Probit 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如表 4 第(4)列和第(5)列所示,管理能力对独立创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管理能力提升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独立创新水平,这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而管理能力提升对合作创新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

表 4 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出口的渠道

被解释变量	(1) 生产率	(2) 是否出口	(3) 直接出口比	(4) 独立创新	(5) 合作创新
管理能力	0.2135 *** (0.0691)	0.3578 *** (0.1111)	0.1327 *** (0.0481)	0.3399 *** (0.1164)	0.0742 (0.1567)
企业年龄	-0.0615 (0.0562)	-0.1495 * (0.0788)	-0.0666 ** (0.0273)	-0.0978 (0.0799)	-0.0558 (0.1099)
企业规模	-0.0033 (0.0297)	0.3570 *** (0.0453)	0.1585 *** (0.0416)	0.3769 *** (0.0448)	0.3353 *** (0.0689)
资本劳动比	0.0302 *** (0.0021)	0.0118 *** (0.0030)	0.0052 *** (0.0015)	0.0176 *** (0.0032)	0.0099 *** (0.0038)
质量认证	0.0542 (0.0635)	0.1671 (0.1143)		0.0865 (0.1122)	0.0687 (0.1686)
Mills			0.2598 * (0.1411)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3060		0.1725		
观测值	1207	1207	1207	1203	1201

4.2 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的异质性影响

前文估计所得的平均效应表明,高管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并促进出口规模的扩张,但是由于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管理能力出口促进效应的形成机理。因此,本部分将分别从企业所属区域、融资约束、企业规模等三个方面进行分组考察。

4.2.1 区分企业所属区域

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差异较大,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当前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位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一般而言较之中西部地区企业具备更高的运营水平和生产能力,可能会对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作用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本文有必要对这一现实因素进行考虑。本文使用的 2012 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问卷所涉及的企业主要分布在我国的 25 个城市,按照“十一五”规划中的相关要求本文将上述 25 个城市区分为中西部和东部城市,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 第(1)~(4)列所示。可以看出,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高管管理能力提升对于企业的出口选择以及出口规模扩张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

管理能力提升则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并且能够进一步提高出口的强度。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在生产率、创新水平等方面整体上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因此管理能力提升能够发挥出更强的出口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较之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企业发展起步较早,接受并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时间较长,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本土企业的组织管理效率,并且可以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管理体系,因此当企业高管管理能力提升时,能够更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出口促进作用。

表 5 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效应:区分企业所属区域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行为	中西部城市		东部城市	
	(1)	(2)	(3)	(4)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管理能力	0.2573 (0.2206)	0.0367 (0.0830)	0.4226 *** (0.1340)	0.1172 *** (0.0365)
企业年龄	-0.2583 * (0.1396)	-0.0698 (0.0800)	-0.1298 (0.0984)	-0.0632 *** (0.0219)
企业规模	0.2540 *** (0.0836)	0.0447 (0.0771)	0.4176 *** (0.0544)	0.1126 *** (0.0322)
资本劳动比	0.0083 * (0.0049)	0.0006 (0.0026)	0.0138 *** (0.0039)	0.0030 *** (0.0011)
质量认证	-0.0241 (0.2113)		0.1987 (0.1375)	
Mills		0.1140 (0.3861)		0.1921 ** (0.0928)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1942		0.2029
观测值	342	342	865	865

4.2.2 区分企业融资约束

由于出口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出口成本,例如国外市场对产品工艺等具有更高的要求以及建立销售渠道需要较大的投入费用等,这些资金需求可能无法完全由企业自身解决,导致企业产生融资需求。因此,获取融资的难易程度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融资约束较大可能会使企业自身的发展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并对企业管理能力造成一定冲击,进一步可能对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影响。对此本文有必要针对融资约束大小对企业进行分组研究。具体而言,本文根据调查问卷中“企业获取资金的难易程度是多少?”进行分组,该问题共设置了 5 档答案,本文将“无障碍”和“较小的障

碍”的企业设定为融资约束小的一组,剩余企业的为融资约束大的一组,结果如表 6 第(1)~(4)列所示。可以看出,对于融资约束小的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的意愿并且进一步促进企业扩大出口;而对于融资约束大的企业,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企业管理能力并未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实质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更可能具备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当管理能力提升时能够发挥出更强的出口促进作用。

表 6 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效应:区分企业融资约束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行为	融资约束小		融资约束大	
	(1)	(2)	(3)	(4)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管理能力	0.4848 *** (0.1220)	0.1638 *** (0.0563)	-0.1162 (0.3690)	0.0286 (0.0462)
企业年龄	-0.1843 ** (0.0872)	-0.0921 *** (0.0263)	0.0637 (0.2348)	-0.0136 (0.0327)
企业规模	0.3398 *** (0.0521)	0.1177 *** (0.0375)	0.5665 *** (0.1115)	0.0672 ** (0.0286)
资本劳动比	0.0111 *** (0.0036)	0.0030 ** (0.0013)	0.0189 *** (0.0064)	0.0013 (0.0011)
质量认证	0.0319 (0.1340)		0.7604 ** (0.2994)	
Mills		0.3246 ** (0.1395)		0.0109 (0.0419)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2030		0.3067
观测值	927	927	280	280

4.2.3 区分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并非成完全的线性关系,换言之,规模越大的企业并不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好的运营绩效(Dhawan,2001)。因此,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其管理能力的提升对于出口的促进作用可能会有差异化的影响,本文针对这一视角进行讨论。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使用员工数量表征企业规模,然后根据调查问卷中“规模”选项对企业规模进行分类:员工人数在 5~99 人之内的是中小规模企业,而超过 100 人的为大规模企业,然后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7 第(1)~(4)列所示。对于大规模企业而言,核心解释变量对是否出口以及出口强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相较于中小规模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对出口强度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说明在大规模企业中,随着高管管理能

力的提高可以增强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在进入出口市场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出口的规模。这可能是由于规模较大的企业相较于小规模企业需要更庞大的组织架构和更复杂的管理体系,这使得大规模企业的管理效率可能低于小规模企业,表现出一定的规模不经济。因此,管理能力的提升对大规模企业的出口能够产生更强的边际效应和促进作用。

表 7 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效应：区分企业规模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行为	中小规模企业		大规模企业	
	(1)	(2)	(3)	(4)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管理能力	0.4417 ** (0.1737)	0.0418 * (0.0242)	0.4233 ** (0.1654)	0.0685 ** (0.0298)
企业年龄	-0.1267 (0.1360)	-0.0198 (0.0231)	-0.1956 * (0.1102)	-0.0661 *** (0.0216)
企业规模	0.5268 *** (0.0923)	0.0586 *** (0.0180)	0.3179 *** (0.1034)	0.0281 * (0.0169)
资本劳动比	0.0120 *** (0.0043)	0.0009 (0.0006)	0.0193 *** (0.0053)	0.0014 * (0.0018)
质量认证	0.1572 (0.1553)		0.2150 (0.2001)	
Mills		0.0363 (0.0261)		0.0693 (0.1052)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1691		0.2645
观测值	645	645	562	562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稳外贸除了继续坚持科技自主创新,加快培育以管理能力为基础的企业出口竞争新优势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有助于从改善企业自身管理能力的视角为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及进一步培育我国出口竞争优势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经验借鉴。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展开的调查问卷数据,合理有效地度量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在此基础上采用 Heckman 两阶段回归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能力对

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这一结论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管理能力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出口;(3)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作用对位于东部地区、融资约束较小、运营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突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为:

(1) 为了更好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内外外部环境以及稳外贸的重要任务,要更加明确企业在稳出口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企业通过改善自身条件以扩大出口的积极性,切实保障出口稳定。在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发挥管理能力在提高企业出口倾向和规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更好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企业自身要积极开展管理变革,可以通过引入具备较强管理经验特别是具有丰富海外工作履历或出口经验等背景的高层管理者,或是使用更加先进的管理体系,通过优化改善企业管理流程以及创新管理方式等手段来调整人力资本配置以全面增强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能力。政府层面可以通过专项补贴或直接参与等形式,引导企业高层管理者积极参加高水平管理培训,切实提高其创新意识和管理能力。

(2) 要更加注重管理能力通过提高企业效率 and 创新能力以扩大出口的作用渠道。对此,企业层面应充分利用管理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管理能力建设,优化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要素的作用,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政府层面可以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和机制改革,推动企业完善管理结构,进一步夯实企业经营管理等基础管理,促使企业不断加强管理革新,优化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的配置,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生产率。除了生产率之外,自主创新也有利于稳定企业的出口,企业要更加注重产品研发和创新,加大科研经费投入,重视对 R&D 的长期投入力度。通过引进国内外优秀专业人才或任用具有技术创新背景的管理者,使企业内部真正做到重视创新、持续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政府部门要牢牢抓住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这一关键,破除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落实支持企业创新的配套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切实为企业创新提供支撑。

(3) 鉴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使得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的效果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因此要重视不同企业的差异性特征,为提高管理能力的出口扩张效应提供充分保障。具体而言,一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首先要充分优化自身组织管理效率,向东部等较发达地区的企业学习或引入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流程,以制度化的管理体系不断提升管理效能。此外,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政

策可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融资约束对企业发挥管理能力的出口效应会有较大影响,因此针对融资约束较大的出口企业应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通过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加强融资支持等政策力度缓解其资金压力,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承担出口成本,提高企业出口的积极性。三是,对于中小规模企业而言,在夯实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以有效应对成长过程中规模扩张产生的管理效率困境。

参考文献

- 程虹,王明明,李唐. 2018. 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新证据[J]. 南方经济, (9): 123-140.
- Cheng H, Wang M M, Li T. 2018. The effects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New evidence based on Chinese employer-employee survey (CEES) [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9): 123-140. (in Chinese)
- 程虹. 2018.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 ——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34(2): 80-92, 187.
- Cheng H. 2018. Does management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4(2): 80-92, 187. (in Chinese)
- 邓悦,蒋琬仪. 2022. 工业机器人、管理能力与企业技术创新[J]. 中国软科学, (11): 129-141.
- Deng Y, Jiang W Y. 2022. Industrial robot, management ability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 *China Soft Science*, (11): 129-141. (in Chinese)
- 段文奇,刘晨阳. 2020. 贸易便利化、企业异质性与多产品企业出口[J]. 国际贸易问题, (5): 72-88.
- Duan W Q, Liu C Y. 2020. Trade facilitation,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and export of multi-product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5): 72-88. (in Chinese)
- 胡昭玲,江璐,汪子豪. 2020. 全球价值链嵌入、管理效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40(3): 117-126, 146, 160.
- Hu Z L, Jiang L, Wang Z H. 2020. Global value chains embedding,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complexity of export products[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40(3): 117-126, 146, 160. (in Chinese)
- 蒋冠宏,蒋殿春. 2014.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J]. 经济研究, 49(5): 160-173.
- Jiang G H, Jiang D C. 2014.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J]. *Economic*

- Research Journal*, 49(5): 160-173. (in Chinese)
- 雷明, 孙曙光. 2010. 一种新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分解模式[J]. 经济科学, (1): 34-41.
- Lei M, Sun S G. 2010. A new decomposition model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s[J]. *Economic Science*, (1): 34-41. (in Chinese)
- 李兵, 李柔. 2017.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 40(7): 102-125.
- Li B, Li R. 2017. Internet and firms' expor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40(7): 102-125. (in Chinese)
- 李唐, 董一鸣, 王泽宇. 2018.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34(7): 86-99, 184.
- Li T, Dong Y M, Wang Z Y. 2018. Management efficiency, quality ability and firm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mpirical studies based on the "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4(7): 86-99, 184. (in Chinese)
- 李唐, 李青, 陈楚霞. 2020. 数据管理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新发现[J]. 中国工业经济, (6): 174-192.
- Li T, Li Q, Chen C X. 2020. The effect of data management ability on firm productivity-new evidence from 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6): 174-192. (in Chinese)
- 李焰, 秦义虎, 张肖飞. 2011. 企业产权、管理者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J]. 管理世界, 27(1): 135-144.
- Li Y, Qin Y H, Zhang X F. 2011. Enterprise property rights, managers'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7(1): 135-144. (in Chinese)
- 刘运国, 刘雯. 2007.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 R&D 支出[J]. 管理世界, 23(1): 128-136.
- Liu Y G, Liu W. 2007. Executive tenure and R&D expenditur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ountr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3(1): 128-136. (in Chinese)
- 马妍妍, 俞毛毛. 2021. 企业金融化行为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分析: 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J]. 世界经济研究, (6): 121-134, 137.
- Ma Y Y, Yu M M. 2021. The effect of firms' financial investment on export scale: Analysis based o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J]. *World Economy Studies*, (6): 121-

- 134, 137. (in Chinese)
- 綦建红, 杨文慧. 2020. 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增量还是提质? [J]. 财贸研究, 31(7): 34-49.
- Qi J H, Yang W H. 2020. Impact of directors with overseas background on company's export activities: Quantity increase or quality improvement? [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31(7): 34-49. (in Chinese)
- 钱学锋, 王菊蓉, 黄云湖, 等. 2011. 出口与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8(2): 37-51.
- Qian X F, Wang J R, Huang Y H, et al. 2011. Exports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elf-selection effect or learning by exporting effect? [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8(2): 37-51. (in Chinese)
- 孙浦阳, 侯欣裕, 盛斌. 2018. 服务业开放、管理效率与企业出口[J]. 经济研究, 53(7): 136-151.
- Sun P Y, Hou X Y, Sheng B. 2018. Service opening, managerial efficiency and firm export[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3(7): 136-151. (in Chinese)
- 田巍, 余森杰. 2013.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9(1): 28-44.
- Tian W, Yu M J. 2013. Enterprise export intensity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ese enterpris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9(1): 28-44. (in Chinese)
- 许家云, 孙文娜. 2017. 海外留学经历促进了企业出口吗[J]. 国际贸易问题, (10): 37-48.
- Xu J Y, Sun W N. 2017. Is foreign study experience helpful to increase firms' expor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0): 37-48. (in Chinese)
- 叶蓁. 2010. 中国出口企业凭什么拥有了较高的生产率? ——来自江苏省的证据[J]. 财贸经济, (5): 77-81, 136.
- Ye Z. 2010. Why do Chinese exporting enterprises have higher productivity? — Evidence from Jiangsu Province [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5): 77-81, 136. (in Chinese)
- 张琦, 郑瑶, 孔东民. 2019. 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研究, 54(6): 183-198.
- Zhang Q, Zheng Y, Kong D M. 2019. Lo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essure, executive's working experience and enterprise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 protecti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a's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2012"[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4(6): 183-198. (in Chinese)
- 张体俊, 黄建忠, 高翔. 2022. 企业管理能力、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5): 155-174.
- Zhang T J, Huang J Z, Gao X. 2022. Firm management ability, TFP and firm export—Based on evidenc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firm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5): 155-174. (in Chinese)
- 郑妍妍, 李磊, 庄媛媛. 2015. 国际质量标准认证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7): 74-80, 115, 128-129.
- Zheng Y Y, Li L, Zhuang Y Y. 2015. ISO standards certification and firm's export activity: Firm-level analysis from China[J]. *World Economy Studies*, (7): 74-80, 115, 128-129. (in Chinese)
- 周茂, 陆毅, 陈丽丽. 2015.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J]. 管理世界, 31(11): 70-86.
- Zhou M, Lu Y, Chen L L. 2015.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enterprise's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try mode: Evidence from Chinese enterpris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1(11): 70-86. (in Chinese)
- Acemoglu D, Akcigit U, Alp H, et al. 2018. Innovation, reallocation,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11): 3450-3491.
- Andersson T, Svensson R. 1994. Entry modes for direct investment determined by the composition of firm-specific skills [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6(4): 551-560.
- Bloom N, Van Reenen J. 2007.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4): 1351-1408.
- Bloom N, Sadun R, Van Reenen J. 2010. Recent advances in the empirics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 105-137.
- Bloom N, Eifert B, Mahajan A, et al. 2013. Does management matter? Evidence from Indi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1): 1-51.
- Caldera A. 2010. Innovation and exporting: Evidence from Spanish manufacturing firms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6(4): 657-689.
- Coşar A K, Demir B. 2016. Domestic road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Turke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8: 232-244.
- Crespi G, Criscuolo C, Haskel J. 200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rganisation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UK firms, CEP Discussion Papers No 783 [R]. London, UK: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 Crowley M, Meng N, Song H S. 2018. Tariff scare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by Chinese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4: 96-115.
- Dhawan R. 2001. Firm size and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S firms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4 (3): 269-293.
- Eisfeldt A L, Papanikolaou D. 2013. Organization capital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expected return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8(4): 1365-1406.
- Feenstra R C, Li Z Y, Yu M J. 2014. Exports and credit constraint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6(4): 729-744.
- Giannetti M, Liao G M, Yu X Y. 2015. The brain gain of corporate boards: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0(4): 1629-1682.
- Giorcelli M. 2019.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1): 121-152.
- Gort M, Lee S H. 2003. Managerial efficiency, organizational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s 03-08[R].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U. S. Census Bureau.
- Heckman J J. 1976. The common structure of statistical models of truncation, sample selection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a simple estimator for such models [M]//Berg S V. *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New York: NBER, 5(4): 475-492.
- Heckman J J. 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 *Econometrica*, 47(1): 153-161.
- Herrera-Echeverri H, Geleilate J G, Gaitan-Riaño S, et al. 2016. Export behavior and board independence in Colombian family firms: The reverse causality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9(6): 2018-2029.
- Jensen J B, McGuckin P H, Stiroh K J. 2001. The impact of vintage and survival on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ohorts of U. S. manufacturing plant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3(2): 323-332.
- Kojima K. 1978.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M]. New York: Praeger.
- Lancheros S, Demirel P. 2012. Does finance play a role in exporting for service firms? Evidence from India[J]. *The World Economy*, 35(1): 44-60.
- Lohrke F T, Franklin G M, Kothari V B. 2003.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ogeneity and SME export performance: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J].

-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Strategy*, 14(1): 86-102.
- Lu D. 2010. 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Lu J Y, Lu Y, Tao Z G. 2010. Exporting behavior of foreign affiliat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1(2): 197-205.
- Masso J, Rõigas K, Vahter P. 2015. Foreign market experience, learning by hiring and firm export performance[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51(4): 659-686.
-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 Oxelheim L, Gregorič A, Randøy T, et al. 2013.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rporate boards: The case of Nordic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4(3): 173-194.
- Qiu L D, Yu M J. 2020. Export Scope, Managerial efficiency,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77: 71-90.
- Raymond V. 199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 2.
- Saidu S. 2019. CEO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performance: Focus on origin, education and ownership[J]. *Journal of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9(1): 29.
- World Bank. 2023.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Yadav N. 2014. The role of internet us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Asian and Sub-Saharan African enterprises[J]. *Global Economy Journal*, 14(2): 189-214.

The Impact of Management Capability on Firms' Export Behavior —A Study on Cultivating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Export

Yiyin Xu¹ Jiahui Wu² Sainan She³

(1. Business School, Chengdu University;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 Sichua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Amidst the complex and intensifying global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it is imperative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xport competitiveness driven by managerial proficiency. This requires a focus not only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enterprises. Drawing on data from a survey of Chinese firms conducted by the World Bank, this study measures managerial proficiency effectively and tests its impact on export behavior using Heckman two-stage regression.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1) Improving managerial proficienc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firms' export inclination and export volume,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sample selection and sensitivity analyses. (2) Managerial proficiency primarily enhances export performance by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innovation. (3) The export promotion effect of managerial proficiency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in the eastern region, with less financing constraints, larger scale of ope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exper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hancing firms' managerial proficiency to enhance thei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further cultivate China's export competitive advantage.

JEL Classification F14, L23, L25